

# 明清以来“西北”概念的变迁<sup>\*</sup>

[日]吉泽诚一郎

(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,日本东京,1130033)

**摘要:**明清时代的水利论所用的“西北”往往指大河北段地区,有时包括北京周边。到了19世纪后半叶,清朝官僚为了对付回民起义或者伊犁问题,将陕西、甘肃、新疆地区称为“西北”。“西北”成为中国国内的地区名称是20世纪初期的历史现象,从刊于《夏声》的文章里可以看到“吾西北”的说法,其前提是中国国土意识的形成,加以各省的地方认同的成熟。因此,在本来的方位概念上,加上了区域概念的用法。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“西北”成为一个大行政区的名称;经常被作为地区概念使用。

**关键词:**西北;西北水利;《夏声》;开发西北论

**DOI:** 10.16382/j.cnki.1000-5579.2015.04.003

## 绪 言

本文的目的在于探寻“西北”概念的历史变迁。“西北”本来是一个方位概念,自古一直沿用至今。如今,“西北”也有指示一定的地理范围之涵义,那么其用法起源于哪里?本文的基本观点是:“西北”不是超越历史的地理概念,而是随着历史进程出现的一种概念。

前辈学者以前讨论过“华北”一词的起源,阐明了近代中国产生“华北”地区概念的背景。<sup>①</sup>本文探讨“西北”概念在历史上的变化,以期理清地理概念的形成因素,尤其是此概念在国家认同和地方意识上所起的作用。与“华北”相比,“西北”概念起源于更早的时代。我们利用台湾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的“清代经世文编10种”电子索引,足以把握各词的大略使用情况。检索“华北”一词时,几乎找不到用例,因而可以理解在清代“华北”概念还没有诞生。<sup>②</sup>与此相反,在清代的各种经世文编中,“西北”的出现不乏其例。其中,有不少文章对比“东南”与“西北”,而提出各自的建议。当然,单纯的方位概念“西北”占了多数。同时,也很容易找到表示某个区域的“西北”之用法。本文想要就“西北”概念的历史变化作初步考察。

另外,看起来跟“西北”概念有关的研究是晚清的西北地理学。例如,顾颉刚在《当代中国史学》(1947年)中指出,晚清史学界有新的趋势,其一为“元史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”。根据顾颉刚的解说,“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,一方面固由于元史研究的影响,一方面又由于西北边事的紧急”。<sup>③</sup>由此可知,西北史地学的形成是从非常现实的关心出发的。<sup>④</sup>然而,应该留意的是,今天所谓的西北史地学,在诞生之初不一定使用了“西北”一词。虽然晚清以后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与当代中国的“西北”概念并非毫无关联,但是本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“西北”一词的用例之上。<sup>⑤</sup>

\* 本文是基于“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”的会议论文(华东师范大学,2015年3月29日)修改而成的。对与会学者的指教在此致谢。

① 张利民:《“华北”考》,载《史学月刊》2006年第4期。

② 林乐知:《俄国新筑西伯利亚铁路说》,收入邵之棠辑:《皇朝经世文统编》卷九〇,称俄国是“亚洲之枕于华北者”。这里所用的“华北”为比较早期的用例,很可能是英文 North China 的译语。

③ 顾颉刚:《当代中国史学》,南京:胜利出版社,1947年,第2页。

④ 参见郭丽萍:《绝域与绝学: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7年。

⑤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,参见樊如森:《近代西北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(1850—1950)》,新北: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2012年。

## 一 明代的用法

永乐皇帝奠都北京以后,明朝政府重视大运河的整备,以便漕粮的运输。漕粮是明清时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,也是江南重赋的原因。鉴之,明代后半期以后,几个官僚提出了改革方案:在北方尤其是畿辅开发农田,以此减轻江南的负担。其中,徐贞明提倡的水利论是前辈学者早已研究过的。<sup>①</sup>他向皇帝的进言之一,即是漕运对人民的困扰:

神京雄踞上游,兵食宜取之畿甸,今皆仰给东南。岂西北古称富强地,不足以实廩而练卒乎。夫赋税所出,括民脂膏,而军船夫役之费,常以数石致一石,东南之力竭矣。又河流多变,运道多梗,窃有隐忧。闻陕西、河南故渠废堰,在在有之;山东诸泉,引之率可成田;而畿辅诸郡,或支河所经,或涧泉自出,皆足以资灌溉。北人未习水利,惟苦水害,不知水害未除,正由水利未兴也。盖水聚之则为害,散之则为利。

根据徐贞明的提案,首先在顺天、真定、河间诸郡以及永平、滦州、沧州、庆云等地整备水利,开发农田,然后“俟有成绩,次及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。庶东南转漕可减,西北储蓄常充,国计永无绌矣。”<sup>②</sup>这则引文使我们了解,“东南”、“西北”的用法与漕运有密切的关系。“东南”指大运河南端的江南地区,“西北”除畿辅以外,还包括河南、山东和陕西。徐贞明在其著作《潞水客谈》中提出了更加详细的水利方案:

当今经国讨谟,其大且急,孰有过于西北水利者乎。虽然,概而行之,则效远而难臻,骤而行之,则事骇而未信。盖西北皆可行也,盍先之于畿辅。畿辅诸郡皆可行也,盍先之于京东永平之地。<sup>③</sup>

可以说,他所提倡的“西北水利”是从畿辅着手,然后逐步推广。他列举了“西北水利”的14条优点。其中也有“东南”与“西北”的对比。例如第3条指出:

东南转输,每以数石而致一石,民力竭矣。而国计所赖,欲暂纾之而未能也。惟西北有一石之入,则东南省数石之输,所入渐富,则所省渐多。先则改折之法可行,久则蠲租之诏可下。东南民力,庶几获甦。<sup>④</sup>

当时,江南地区在征收漕粮时,有加征“余米”的习惯。根据徐贞明的提案,如果“西北”的农业发展起来,就可以节省运输过程中的损耗,减轻江南的负担。徐贞明主要关注点在于改革漕运制度,因而他所说的“西北水利”,基本上是为了畿辅附近的农田开发。

万历年间,徐光启也提出过关于漕运的方案,列举了漕运的弊端。其中,他提到了水的有限性:

如今法运东南之粟,自长淮以北诸山诸泉,涓滴皆为漕用,是东南生之,西北漕之,费水二而得谷一也。凡水皆谷也,亡漕则西北之水亦谷也。故曰漕能使水费也。<sup>⑤</sup>

徐光启指出,保持运河的水量导致山东、北直隶的农业用水十分匮乏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的“西北”不包括陕西以西的地区。徐光启将上面引述的徐贞明文章收载于《农业全书》之中。<sup>⑥</sup>可以说,徐光启的漕运论也在徐贞明的“西北水利”系谱之中。田口宏二郎曾经指出:明代的“西北”概念与漕运问题有密切的关系,出自江浙的官僚往往与他们的家乡“东南”相对照,而将畿辅附近称为“西北”。<sup>⑦</sup>应该注意到,“东南”和“西北”的对比,是以明代财政运营的特性为背景的。

道家张履祥(浙江桐乡人)在崇祯年间所撰的读书札记《愿学记》中写道:“一州之土物,自足养一州之人民,而使西北必仰给于东南,赋法必当变。”<sup>⑧</sup>虽然张履祥没有加以详细的解说,但是至少可以从

① [日]森田明:《清代水利社会史的研究》,东京:国书刊行会,1990年,第321—353页;[日]党武彦:《清代经济政策史的研究》,东京:汲古书院,2011年,第201—248页;[日]田口宏二郎:《明末畿辅地域における水利开发事业について:徐贞明と漕运河河工》,载《史学杂志》第106编第6号,1997年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二二三《徐贞明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5881页;第5881—5882页。

③④ 徐贞明:《潞水客谈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续修四库全书,1995年,第1页;第3页。

⑤ 《漕河议》,收入王重民辑校:《徐光启集》(上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年,第19页。

⑥ 石声汉校注:《农政全书校注》(上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,第286—316页。

⑦ [日]田口宏二郎:《明代河北の农业经济と大运河:近世中国における畿辅》,载《东洋史研究》第71卷第4号,2013年。

⑧ 张履祥:《杨园先生全集》(中),北京:中华书局,2002年,第767页。

中看出,围绕漕运问题对比“东南”与“西北”的说法,在明末社会中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。

除漕运问题以外,还有几位明人在策划备边时,言及了“西北”。在《皇明经世文编》第90卷中,收录了李杰的《论西北备边事宜》和董越的《论西北备边事宜》。<sup>①</sup>李杰指出,“比岁以来,虏骑猖獗,西北之民,近边者苦于驱掠,内郡者疲于转输”。李杰要讨论的是鞑靼、瓦剌入侵的问题。虽然此处并未对所谓的“西北”进行明确说明,但是可以想见“西北”大概意味着山西、陕西等地。李杰在同一文章中还写道,“西北二边,境土辽远,虏一鸣鞭,即抵城下。”这里的“西北二边”应该是西边与北边的意思,不算一个地区的范围。要应付蒙古入侵问题的明人,有时论及“西北”。与水利论者不同,他们所说的“西北”大概是以北京为中心,指的是西北边疆。虽然如此,李杰所用的“西北”是西北方向的意思,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的方位概念,不能看作是一种地区概念。

## 二 清代的用法

### (一) 水利论的延续

“西北水利”论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清代。例如,康熙年间的官僚许承宣(安徽歙县人)撰写《西北水利议》,提议:“各省每县增设农田官”。农田官是一种捐纳官,由他们出资并推进农田开发。许承宣期待:“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,即东南岁漕可渐减。”<sup>②</sup>他主张:“是则燕豫秦晋齐鲁,皆可通行。”<sup>③</sup>因此,他所说的“各省”指的是直隶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和山东。

还有从经学出发谈到水利问题的论者。《周礼》地官“遂人”条中对水利理论有所谈及。在康熙年间做官的尤珍(苏州人)指出:“周之兴在西北,西北地多广平,非若东南高下相错。故东南水利,半由天造,而西北尽关人力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西北”的范围不太明确。然而,从“周之兴在西北”一句,至少可以判断陕西在“西北”之中。尤珍的目的不但在于解释经义,还在于提出关于水利的建议。因此他继续说明,“西北之雨,多在夏秋。其滂沱而无所归,必泛滥而并纳于河,河不能容而堤将失。”<sup>④</sup>洪水在河南、直隶较为严重,据此足以推测他所说的“西北”也包含了这两个省份。

到了嘉庆年间,沈梦兰撰写了《五省沟洫图说》。“沟洫”的典故也出自《周礼》地官“遂人”条。根据《五省沟洫图说》自序,有人询问沈梦兰沟洫的意义,沈则回答道:

“此古人平土地法。……三代之时,尽力沟洫,冀雍兗豫诸州,罔非沃土。是以举方三千里之地,给千八百国诸侯之用,而无不足也。今西北水利,废塞不讲久矣。余尝按之古法,考之地势,准之人功,计不过二十日,而周官五沟五涂之制,可以悉复。”<sup>⑤</sup>他所谓的“西北水利”意味着“冀雍兗豫诸州”的水路体系。禹贡九州中的“冀雍兗豫”大致相当于清代的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和甘肃。

《五省沟洫图说》中载有《五省水道图》,并且说明了各条河的源头及经过之地。根据此说明,这本书所谓的“五省”指的是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五省以及直隶(在此直隶不算省份)。沈梦兰写道:

沟洫之制,无地不宜,而西北为尤亟。西北地势平衍,而多散漫,河流飘劲,而多浑浊。自古称黄河一石水六斗泥。他如陕西之泾渭、山西之沁汾、直隶滹沱永定等河,皆与黄河无异。<sup>⑥</sup>

沈梦兰也利用“东南”与“西北”的对比,列举了沟洫之利。其中有说:“东南耕田,人不过十余亩。西北人力无所施用,俗语所谓望天收。沟洫既开,漫田悉作畎田。”<sup>⑦</sup>因为“西北”就是需要复兴沟洫的地方,所以这里所说的“西北”大致等于“五省”。另外,《五省沟洫图说》引用了徐贞明的《潞水客谈》,可见沈梦兰的关注点亦受到前代水利论的影响。

林则徐的著作《畿辅水利议》可以说是明清时代水利论之集大成。《畿辅水利议》引用徐贞明、徐光启、徐承宣、沈梦兰的文章,并进行了自己的分析。据林说,“西北水田,久置不讲,一旦兴举,事同创始。

① 陈子龙等辑:《皇明经世文编》卷九〇,第1—11页。

②③ 许承宣:《西北水利议》,台北:艺文印书馆,百部丛书集成,1970年,第2—3页;第3页。

④ 尤珍:《进呈经义》,收入贺长龄辑: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卷十,第43—44页。

⑤⑥⑦ 沈梦兰:《五省沟洫图说》,光绪六年江苏书局重刻本,自序,第8页;第6页。

利益虽宏,土宜虽得,而未经试可,人将不信。”“水田之兴,西北大利也。”<sup>①</sup>从《畿辅水利议》的基本主张来看,林则徐所用的“西北”首先指的是畿辅。他说明了在畿辅种植稻米的可能性以及重要性,指出:“直隶土性宜稻,有水皆可成田”<sup>②</sup>。《畿辅水利议》的结论部分提出了逐步实行的计划:

今请俟畿辅倡行之后,确有明效,且共睹稻田之入倍于旱田,自必闻风兴起。乃以营种之法颁之山陕豫东诸省,令各随宜相度,以渐兴举。由是推行愈广,乐利愈宏,财用阜成,家给人足,风俗纯厚,经正民兴。东南可藉苏积困,而西北且普庆屡丰。<sup>③</sup>

众所周知,对林则徐而言,改革漕运是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因此,他的“西北”概念基本上只是明代以来水利论的继承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## (二) 晚清的转换

进入19世纪以后,不少论者在讨论清朝的军事战略时使用了“西北”一词。这大致与新疆统治、对俄防备、镇压回民起义有关。例如,魏源即著有《答人问西北边域书》一文。这是他“承询本朝西北边域之略”时,用以作答的短文。在说明“西北藩服”时,魏源列举了蒙古的盟旗、准部各营。接下来,他指出“由西北迤西南,即天山南路,皆回子境。”<sup>④</sup>这里所用的“西北”之内涵,在把握上有些困难。“西北”好像是一种方位概念,然而,判断方位的基点在哪里?可能是以京师为中心。虽然如此,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论及了青海、西藏,令人感到费解。还有一个可能性是,他所说的“西北”是西边和北边的意思。我暂时没法解开这个疑问,但可以确定的是,魏源在《答人问西北边域书》中所用的“西北”概念,不会包括北京附近地区。这与林则徐《畿辅水利议》中的用法有明显的区别。

到了19世纪后半叶,保卫边疆的政策日益重要。尤其是回民起义以及俄国的占领伊犁,成为清朝官僚需要对付的大问题。“塞防”与“海防”的论战是最有名的例子。1874年,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对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,因而主张海防是当前的紧要课题:

历代备边多在西北,其强弱之势、客主之形皆适相埒,且犹有中外界限。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,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,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,阳托和好之名,阴怀吞噬之计。<sup>⑤</sup>

这里所说的“西北”虽然没有明确的所指,但是可以理解为指代着内陆边疆地区。反之,湖北总督李瀚章则上奏称:“东南防务,固宜认真图谋,西北征军,尤贵及时清理。新疆回逆尚未剿灭净尽,自难遽议撤兵。”<sup>⑥</sup>李瀚章所用的“西北”,应该包含新疆等地。1877年,左宗棠在奏折中称:“伊古以来,中国边患,西北恒剧于东南。盖东南以大海为界,形格势禁尚易为功。西北则广袤无垠,专恃兵力为强弱。”<sup>⑦</sup>1881年,张之洞指出:“今日防患之道,其大者无如西北之边防,东南之海防。”<sup>⑧</sup>在这些例子中,“西北”与“东南”之对比指的是边防军事作战方面,不一定是明确的地区概念。

对“西北”边防的关注,当然是同治年间以后的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个时代,漕运事业的衰退使得“西北”水利论的影响力日益弱化。

到了光绪末年,防卫国土成为广大中国士人所关心的重要问题。这与梁启超在日本宣传的“瓜分”说法很有关系。梁启超撰写的《南海康先生传》列举了康有为的中国政策,其中第9条说:“先生谓内治稍有端绪,当经营西北。移民实蒙古、新疆、西藏,辟其富源。一,以纾东南人满之忧。二,以为争雄欧西之基。”<sup>⑨</sup>有趣的是这里所说的“内治”与“经营西北”之间的关系。换句话说,“经营西北”是否为“内治”的一部分?好像梁启超也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。

①②③ 林则徐:《畿辅水利议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续修四库全书,1995年,第24、35页;第9页;第61页。

④ 《魏源全集》第12卷,长沙:岳麓书社,2004年,第472页。

⑤ 顾廷龙、戴逸主编:《李鸿章全集》第6册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8年,第159页。

⑥ 《合肥李勤恪公政书》,卷六。

⑦ 《左文襄公全集》,奏稿卷五〇,第75页。

⑧ 赵德馨主编:《张之洞全集》第1册,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8年,第47页。

⑨ 任公:《南海康先生传》,载《清议报》第100册,1901年12月。

“西北”成为中国国内的地区名称是20世纪初期的历史现象。陕西留日学生编辑的杂志《夏声》(1908年)中的用法足以作为例证。<sup>①</sup>这份杂志的《征文广告》呼吁大家投稿:

陕甘存亡,尤与神州全局有绝大关系。当此千钧一发、悬崖勒马之秋,西北防备日迫一日。凡系陕人,均有责任,鼓其热诚以为同胞倡,奋其精神以御异族侮,使此半壁河山不为碧眼黄发儿之殖民地、畜牧场。以保西北而保全中国,他日百二重关再睹天日,邑里扬芬,河岳增色。诸君子之力,亦本社同人之荣也。爰不揣冒昧,敢请以推爱吾陕之心,爱本社,吾陕幸甚,西北幸甚,中国大局幸甚。<sup>②</sup>

就这篇文章来讲,不可缺少的前提是陕西属于“西北”,“西北”属于中国。因此,“西北”可以说是包括陕西等几个省份的中国之一部分。很明显,这里所说的“西北”是一个地理范围。刊登在《夏声》创刊号上的来稿《西兰铁路绪言》主张陕西、甘肃、新疆三省合作推进西兰铁路的建设,其理由如下:

……盖尝吁衡天下大势,东南如腹足,而西北则其首部也。故自古据有西北者,恒足以制东南,而东南则反是。诚以建筑之势,雄踞上游,形势既得,易如破竹。征诸已往,历历可数,则欲保东南,必先保西北,实为一定不移之铁案。彼秦陇者,岂非西北之堂奥,而新疆者,又非秦陇之藩篱乎。<sup>③</sup>

在载于《夏声》的几篇文章中,可以看到“吾西北”的表达。例如,第4号刊载了论述森林与气候关系的译文《森林学概论》,译者加有如下按语:

按此条于吾西北有最大利益。陕甘两省,地处西陲,抱大陆气候。……使西兰铁道一开,异日全国木材,仰给于西北者,不知达何地位。是森林实富源所在。吾乡人士多明于自利,其亦有起而为之者乎。<sup>④</sup>

“吾西北”无疑显示了译者的认同意识。并且,“吾乡”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含义。第5号的《开发西北回部之根本问题》也指出,“吾西北,汉回民族杂处,奄奄待毙,交困于槽枥之下。”<sup>⑤</sup>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呼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侮。

总之,在《夏声》登载的论文中,“西北”是中国国土的一部分,大致指陕西、甘肃、新疆三省。《夏声》的特征,即在于将“西北”看作自己的乡土,并不断强调为保全中国领土,西北的保卫和发展不可忽视。由此可见,晚清时期的民族主义和乡土认同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。

### 三 民国时期的“开发西北”论

民国时期,意味着中国西北地区的“西北”用法,非常普遍,不胜枚举。冯玉祥的“西北军”即是一例。但是,“西北”的地理范围不一定是固定的。民国时期流行的“开发西北”论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。1920—1930年代,不少论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开发方案。但是,大部分的提案都没有考虑财源方面的问题,只是纸上谈兵。<sup>⑥</sup>下面列举两个提案。

第一,1928年8月,国民政府交通部召开了全国交通会议。甘肃省代表马鹤天提出了“在最短期间完成西北最要之路线案”,主张:“吾国西北——蒙青甘新藏——各部幅员辽阔几占全国之半。然无寸里铁路,汽车路除甘肃外亦无一线。”<sup>⑦</sup>他所说的“吾国西北”大致是指蒙古、青海、甘肃、新疆和西

① 《夏声》收入《晚清珍稀期刊汇编》,北京: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,2009年,第37—38册。就内容概要、政治倾向等参见林斌生:《夏声》,载丁守和主编: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》第3集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3年。

② 《本社征文广告》,载《夏声》第6号,1908年7月。文中的“百二重关”代指陕西(典出自唐骆宾王的《帝京篇》)。

③ 今吾:《西兰铁路绪言(来稿)》,载《夏声》第1号,1908年2月。

④ 陈生:《森林学概论》,载《夏声》第4号,1908年5月。

⑤ 回复:《开发西北回部之根本问题》,载《夏声》第5号,1908年6月。

⑥ [日]吉泽诚一郎:《西北建设政策の始动:南京国民政府における开发の問題》,载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148册,2005年。电子版已在网上公开,参见<http://repository.dl.itc.u-tokyo.ac.jp/dspace/bitstream/2261/25787/1/ioc14802.pdf>。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“西北”观,参见沈松桥:《江山如此多娇: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象》,载《台大历史学报》第37期,2006年。

⑦ 《全国交通会议汇编》,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处,1928年,第208页。

藏。马鹤天是研究边疆问题的著名人物。他在这个议案中提出的是要发展交通,并以此统一中国。

第二,1930年3月,中国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讨论了“由中央与地方建设机关合资开发黄、洮、泾、渭、汾、洛、颍等河水利以救济西北民食案”。提案称:“西北各省——陇、秦、豫、晋、绥——为我国民族最早繁殖之地,向赖黄、洮、泾、渭、汾、洛、颍各大河滋润灌溉之利,故能土壤膏腴,农产繁富。”<sup>①</sup>这个提案的重点在于推动黄河水系的水利开发。“西北各省”指的是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山西、绥远五省。

	蒙(绥)	青海	甘肃	新疆	西藏	陕西	河南	山西
马鹤天	○	○	○	○	○			
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	○		○			○	○	○

就“西北”的内涵进行比较,可知马鹤天提案和国民党三届三全会议案所指的地理范围,有很大差异(详见上表)。可以说,在民国时期,“西北”的地理范围尚没有明确的界定,还是有些模糊的地方。

### 小 结

明清时代的水利论所用的“西北”往往指大河北段地区,有时包括北京周边。到了19世纪后半叶,清朝官僚为了对付回民起义或者伊犁问题,将陕西、甘肃、新疆地区称为“西北”。20世纪初,从刊于《夏声》的文章里可以看到“吾西北”的说法,其前提是中国国土意识的形成,加以各省的地方认同的成熟。因此,在本来的方位概念“西北”上,加上了区域概念的用法。

最后要补充一下“二战”结束之后的情况。1945年,国民党将第八战区改组为西北行营(位于兰州,主任张治中)。1947年西北行营改为西北行辕,1948年又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。<sup>②</sup>张治中将军虽然是首任西北军政公署长官,但于1949年离开兰州,并参与跟共产党的谈判,最后进入共和国政权。

共产党方面,有彭德怀将军的西北野战军(后来改名为第一野战军)。1949年,中共西北局成立,第一书记为彭德怀,第二书记为贺龙,第三书记为习仲勋。1950年,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,开始统管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五省。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为彭德怀,副主席为张治中和习仲勋。彭德怀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说:“西北是一个土地辽阔的地区,面积三百一十万平方公里,占全国领土三分之一。”<sup>③</sup>习仲勋也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道:“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有汉、回、维吾尔、藏、蒙古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。”<sup>④</sup>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“西北”成为一个行政区域,并划分了明确的范围,因此彭德怀和习仲勋所指的“西北”之面积大致相同。共和国成立以后,设有大行政区制度(1949年左右成立,1954年撤销)。大行政区是一种过渡期的行政机构,分为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华东、中南、西南。大行政区的设置,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有密切的关系。其实,当时的大行政区相当于六大军区。<sup>⑤</sup>

就是到了今天,“西北”、“东北”、“西南”这三个方位概念也经常被称为地区概念使用,但是“东南”作为地区概念,似乎并未得到普遍认可。1950年代没有设立“东南”行政区和军区的影响,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(责任编辑 孔令琴)

① 《中央党务月刊》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特号,1930年,第100页。  
② 彭铭鼎: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由来》,《甘肃文史资料选辑》第29辑,1988年。  
③ 《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》(1950年1月7日),彭德怀传记编写组:《彭德怀军事文选》,北京:中央文献出版社,1988年,第316页。  
④ 习仲勋:《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》(1950年1月19日),《习仲勋文集》,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,第150页。  
⑤ 李格:《略论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建立》,《党的文献》1998年第5期;范晓春:《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》,《当代中国史研究》第16卷第4期,2009年;王树林:《新中国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的缘起与演变》,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0年第6期。